

一个国家

“一国两制” 在香港、澳门的
成功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究

两种制度

齐鹏飞 著



人民出版社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究

齐鹏飞 著

责任编辑：赵圣涛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究 / 齐鹏飞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

ISBN 978-7-01-016279-9

I. ①一… II. ①齐… III. ①一国两制—研究 IV. ①D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1035 号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究

YIGUOLIANGZHI ZAI XIANGGANG AOMEN DE CHENGGONG SHIJIAN JIQI LISHI JINGYAN YANJIU

齐鹏飞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6.25

字数：400 千字 印数：0,001—3,500 册

ISBN 978-7-01-016279-9 定价：7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论:

港澳问题研究, 必须凸显问题意识、前沿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导向	1
一、本书的研究意旨	1
二、本书的研究基础	4
三、本书的研究重心和研究路径	12
四、本书的研究难点以及拟创新之处	16

第一章: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与港澳回归	21
一、“边缘问题”不边缘	24
——当代中国国家统一的“三大历史遗留问题”——港澳台问题	
二、“长期打算, 充分利用”与“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29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解决港澳台问题的“思想遗产”和“政策遗产”	
三、“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37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港澳台问题的“科学构想”	
与基本国策的酝酿和正式出台	
四、“剔除殖民主义、保留资本主义”	48
——中英、中葡解决港澳问题的外交谈判和港澳“移交大典”	

第二章:

破解治国理政的“崭新课程”和“重大课题”	63
一、江泽民与新港澳的“一国两制”建设	64

二、胡锦涛与新港澳的“一国两制”建设	95
三、习近平与新港澳的“一国两制”建设	127
第三章:	
香港回归以来的经济与政治发展大势	166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成功实践	
一、“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66
二、“背靠内地,面向世界”,“新香港”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 巨大成绩	171
三、以“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为依归,“新香港” 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	199
第四章:	
澳门回归以来的经济与政治发展大势	233
——“一国两制”在澳门特区的成功实践	
一、“新香港”、“新澳门”的“一国两制”实践不能简单比附	239
二、建设“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的路向和地位凸显, “新澳门”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	242
三、公共行政改革稳步推行,国家认同深入人心,“新澳门” 政治发展取得历史性的重大进步	304
结语:	
“‘一国两制’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丰富和发展”	366
主要参考文献	403
补 记	414

导论:

港澳问题研究, 必须凸显问题意识、 前沿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导向

一、本书的研究意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继承和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定要彻底洗刷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殖民主义耻辱、全面实现新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夙愿的基础上, 在继承和发展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8年)实行的对于港澳问题“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以“长期打算, 充分利用”特殊的战略决策和具体实践的基础上, 超越“教条化”、“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而从维护新中国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核心利益的最高宗旨出发, 从港澳地区的历史和现实出发, 顺应时代主题和国内外形势的新演进、新变化, 与时俱进, 锐意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统一和国家治理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有机结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对解决港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全局性的、战略性的调整, 在新中国第二个“三十年”(1979年至今)里逐步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新理念”、“新战略”、“新政策”并付诸实践, 全面、彻底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港澳问题, 实现了对港澳地区恢复行使主权, 实现了港澳回归。

其后，又进一步把在港澳地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问题，提升到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和“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课题”的战略高度，锐意推进港澳地区的“一国两制”建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九七”、“九九”前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的港澳回归，以及“九七”、“九九”后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推进的港澳地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工作，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伟大工程之“率先垂范”的创新和试验，作为举世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作为当代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逐步得圆的基本体现和标志性事件，而载入史册的。无论是1979年至1997年的香港回归、1985年至1999年的澳门回归，所创造的以外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和主权争端问题的独特经验，还是1997年、1999年至今已经19年、已经17年的新港澳的“一国两制”建设，以“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的方式，圆满解决一个民族国家、一个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之间、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实现有效治理与和谐发展问题的独特经验，均同样丰富而深刻，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揭示以为继续前行之借鉴。

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港澳回归、圆满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和主权争端问题，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港澳地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成功解决一个民族国家、一个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之间、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的有效治理与和谐发展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统一和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创新性发展的一大独特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创新性发展的一大独特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以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当代世界创新性发展的一大独特贡献。以“十二条”特殊政策、“联合声明”、“基本法”为主要内容而建构的实现国家统一的“一国两制”之“港澳模式”以及港澳回归的成功实践，以港澳“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

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高度统一，“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而建构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国两制”之“港澳模式”以及新港澳“一国两制”建设的成功实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和当代世界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统一、整合和有效管辖、有效治理的一条新路，不仅对于当代中国继续解决类似的国家统一问题如台湾问题，类似的领土争端问题如中印边界问题等，具有“率先垂范”的参考、借鉴和启示之益，而且对于当代世界继续解决类似的国家统一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类似的领土争端问题如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等，同样具有“率先垂范”的参考、借鉴和启示之益。

就学界范围而言，对于所谓的“一国两制”之“港澳模式”的问题，长期以来，对于其核心概念的认识和界定一直有仁智互见的不同意见。在本书中，笔者采用的是学界已经形成初步共识的主流意见，即这里所言之“一国两制”的“港澳模式”，包括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九七”、“九九”港澳回归前的“国际争端解决模式”和“国家统一模式”；其二是指“九七”、“九九”澳门回归后的“国家治理模式”和“中央和地方关系模式”。本书研究的重点是涉及第二层含义的基本内容——当然，是以第一层含义的基本内容为背景、基础和前提的。也就是说，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梳理和阐释“九七”、“九九”港澳回归后，在“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奠基性的“第一个三分之一”时段里，中国共产党（主要涉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如何从在“一国两制”的大背景、大框架下正确处理“国家治理”问题和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的战略高度出发，从在“一国两制”的大背景、大框架下有效破解“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这一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和“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课题”的战略高度出发，从在“一国两制”的大背景、大框架下彻底实现“港澳人心回归”和“港澳长治久安”长远目标的战略高度出发，锐意推进在港澳的“一国两制”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锐意推进在港澳的“一国两制”建设和发展之历史进

程和基本经验。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的“港澳梦”，其全面得圆，一样需要我们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同理，要明晰论证“一国两制”之“港澳模式”的价值和意义，也要求我们必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所以，本书的研究，其基本定位为——以问题意识、前沿意识、创新意识为导向，既是已经拉开距离、已经在沉淀和过滤而要求“历史感”非常突出的“过去进行时”的学术研究，又是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的、结构性矛盾和阶段性特征正在逐步呈现而要求“现实感”非常突出的“正在进行时”的政策研究，必须凸显其学术探索性和现实针对性。

二、本书的研究基础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究”，是目前中共党史（尤其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史）和当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包括港澳台地方史）研究领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研究领域，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和热门课题。其学术探索价值和理论与实践意义不可低估。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的近四十年间，由于在“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专题研究方面，在港澳回归和新港澳的“一国两制”建设的专题研究方面，一直有令学界思想兴奋的焦点呈现，所以，“追踪式”甚至是“反思式”的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无论是基础性研究资料的挖掘和收集、整理和公布，还是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专题式”甚至是“全程全景式”的探讨性的研究和梳理、阐释，都为本书的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前期基础和学术积淀。但是，理性地分析，必须指出的是，与本书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严重不平衡，在许多方面存在程度不一的缺憾，研究不全面、不深入、不系统。

关于“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专题研究，关于港澳回归的专题研究，在港澳回归“进行时”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是一个高峰期。自“总设计师”邓小平晚年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国家统一”之“新理念”、“新战略”、“新政策”，“揭幕”中英、中葡解决港澳问题的外交谈判并以正式签署“九七”香港回归、“九九”澳门回归的“联合声明”“谢幕”以后，港澳问题就逐步成为中国（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和国际（主要是英国、葡萄牙、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在香港、澳门有特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西方国家）政治学界、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凝焦的“热点”研究课题。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的驱动，中国内地的学术界对于港澳问题的研究重点，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继承和发展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理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香港回归结束香港156年（1841—1997）英国“殖民统治”、澳门回归结束446年（1553—1999）葡萄牙“殖民统治”，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当代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象征性”和“标志性”意义。而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葡萄牙包括英国、葡萄牙影响下的中国港澳地区，其学界对于港澳问题的研究重点是港澳回归在国际关系、国际法“逻辑”中的“合法性”问题，是世界政治发展史的“奇迹”——“一国两制”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香港现象”、“澳门现象”的“兼容”问题，是中国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背后的“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问题。进入自旧香港至新香港的“十二年过渡时期”（1985—1997）、自旧澳门至新澳门的“十二年过渡时期”（1988—1999）以后，随着“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小宪法”——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出台，尤其是在进入香港“后过渡时期”（1990—1997）、澳门“后过渡时期”（1992—1999）以后，由于中英两国在所谓香港“民主化”问题上的纠葛，由于中葡两国在澳门“旧三大问题”、“新三大问题”上的纠葛，肇中英、中葡双方“全面合作”的“蜜月期”结束，而开始了中英、中葡双方的“全面对抗”或“局部对抗”并逐步“国际化”（主要是美国的介入），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学术界的“香港

热”、“澳门热”也持续升温。一方面，在中国内地，不仅仅是学界，而且社会各界，以“港澳明天更好”为主旋律，以“一国两制”的政策宣传为重点，对于港澳回归倾注了太多的“献礼”热情，一时间，港澳回归成为媒体“曝光”最频繁的一个词，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统计，港澳回归“倒计时”归零以前的几年间，平均每年以港澳回归为主题的会议逾百场、著作逾百部、文章逾千篇，且不计坊间各种版本的港澳回归“演义”。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于港澳回归则“悲观主义”弥漫。英国、葡萄牙的历史学家对于“太阳落山”心怀戚戚，对于英国在香港 156 年、葡萄牙在澳门 446 年“借来的空间”和“借来的时间”的“殖民化”和“非殖民化”的“辉煌的文明史”大唱挽歌；由于美国长期觊觎英国、葡萄牙对于港澳这两个环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自由港”和“国际经济中心”的“垄断”地位，其在英国、葡萄牙“光荣撤退”之际对于“维护港澳稳定和繁荣”的“道义感”陡升，1995 年前后，美国政治学界关于“一国两制”就是“自由消失”、“民主消失”、“人权消失”、“法治消失”的“1997 年大限”、“1999 年大限”说，美国经济学界关于港澳回归就是“香港之死”、“澳门之死”说甚嚣尘上。至于“台风眼”中的香港、澳门，其学界的心态颇为复杂，作为中国人，即使是那些已经“英国化”、“葡萄牙化”的中国人，他们没有理由对港澳回归说“不”，但是，“一国两制”毕竟予他们以“不安全的陌生感”，在他们变“身份”的时候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中，对于“九七”、“九九”是喜忧参半。

颇耐人寻味的是，由于港澳“移交大典”和自旧香港至新香港、自旧澳门至新澳门的“转型”没有“新闻”，加上中央政府和内地对于“港人治港”的新香港、“澳人治澳”的新澳门“不干预”政策的敏感性，中国内地“九七”、“九九”以前的“香港热”、“澳门热”在“九七”、“九九”以后迅速降温，学界的港澳问题研究亦“戛然而止”，一度的“显学”——“香港学”、“澳门学”仿佛是在一夜间走向“边缘化”。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统计，港澳特区成立以后的几年间，关于港澳回归问题研究的著作平均每年不超过 10 部、文章不超过百篇。“不甘寂寞”的学界已经“赶场”新的“热点”，刚刚成为“历史”的港澳回归已经开始“尘封”，已经开始在学

术视野里模糊不清。一样“缄口”的是中央政府直辖的港澳特区的学界，除了港澳回归的纪念日，如中英、中葡“联合声明”签署15周年和20周年、港澳“基本法”出台10周年和15周年，港澳特区成立一、五、十周年的“纪念性”文章和“回忆录”，关于港澳回归问题研究的著作为数寥寥。但是，西方国家尤其是在旧香港、新香港和旧澳门、新澳门均有直接或间接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关系和意识形态考虑的英国、葡萄牙和美国等，对于“一国两制”的港澳“热情”不减，英国、葡萄牙和美国政府每年都定期向各自国家的国会提交以“自由资本主义”“变”与“不变”为主题的“香港报告”、“澳门报告”，英国、葡萄牙和美国的政治学界、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关于港澳问题的“常态”和“非常态”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不辍，在他们标榜“价值中立”的关于港澳问题研究的“客观化”学术成果中，港澳回归的成功因素被“主观地”解读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的“惯性”，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的“弹性”。

在“九七”、“九九”的“喧哗”渐渐隐去之际，细细翻检“九七”、“九九”港澳回归之初几年间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关于港澳问题的学术成果，可以发现，高质量、高水平的“精品”不过数十部计，而且主要是关于旧香港、旧澳门时期的政治制度（包括法律制度，以及港澳“基本法”问题）、经济制度的梳理和阐释，主要是没有以“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澳门模式”为成功个案和实证研究基础的纯粹理论层面进行的“一国两制”的价值和意义的探讨，而对于港澳回归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新香港、新澳门的“一国两制”建设史的研究，则基础非常薄弱，成果非常少，成为一个颇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港澳问题研究的“停滞期”和“空白期”。

当然，这种颇为异样的“沉寂”并没有持续太久。2003年7月1日香港回归六周年纪念日突然爆发的香港街头50万人“反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大游行以及接下来直接导致的香港“国家安全条例”本地立法进程被粗暴打断并被“无限期”的搁置，让香港回归以来所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深层次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其表象是激进的香港市民尤其是所谓香港反对派（或曰“泛民主派”）对香港特区政府的极端不信任，而实质上是激进的香港

市民尤其是所谓香港反对派（或曰“泛民主派”）对于中央政府和内地人的极端不信任。其后持续发生的诸如在香港“双普选”之“时间表”和“路线图”问题上无休止的政治纷争、在香港“国民教育科”立与废问题上激烈的政治冲突、在香港与内地双向交流问题上不断升级的摩擦和对立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让我们在港澳回归之初几年间盲目乐观的情绪彻底一扫而空。人们似乎在一夜间忽然发现，港澳问题并没有随着港澳回归的实现而自然而然地画上句号，成为历史、成为“过去时”，画上句号，成为历史、成为“过去时”的仅仅是“国家统一”范畴和层面的港澳问题，而“国家治理”范畴和层面的港澳问题则刚刚开始，处于“正在进行时”。人们对于“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英“联合声明”刚刚换文生效、香港“十二年过渡时期”刚刚开始之际就已经明确警示的远见卓识——“一国两制”在港澳是不是真正成功，是不是具有生命力？有两个重大考验：一个是“九七”、“九九”以前，港澳是不是能够平稳过渡、顺利交接；一个是“九七”、“九九”以后，港澳是不是能够“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后一个考验更重大、更艰巨，逐步有了切身的感悟和体认，对于前所未有的“存一国之大同、求两制之大异”之“一国两制”全新试验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逐步有了切身的感悟和体认。以此一大转折为历史契机，国内学界对于港澳问题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重新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高度重视，各种研究机构逐步恢复或再设立，各种研究课题纷纷立项，各种学术会议接连不断，各种研究成果——包括专题资料、研究专著、论文和内部调研报告等批量涌现，推动港澳问题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不断升温，出现了一个新的“小阳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内学界在港澳回归几年以后出现的这个港澳问题研究的“小阳春”，是与执政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港澳问题、港澳工作重新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高度重视之大背景分不开的。其直接的驱动力，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明言的辩证逻辑——“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35年来，我

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①在港澳回归以后“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不断遭遇新挑战、新机遇的新形势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秉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重新将港澳问题、港澳工作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中心环节之一来认识、来处理，重新将港澳“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新考验提升到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和“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课题”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来处理，逐步改变了香港回归之初为了安定人心、为了力避“干预”之嫌而“不该管的没有管、该管的也没有管”的“矫枉过正”不利现象以及相对被动局面，开始真正地负起中央政府对于港澳应有的“管理”和“治理”的宪制责任，开始明确而突出地强调港澳的“一国两制”建设，必须是“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必须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高度统一，必须是“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的有机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中央领导集体也开始重新关注和高度重视学界对于中央决策部门在拟定“治港方略”、“治澳方略”中的“思想库”、“智囊团”之政策咨询功用。2003年香港局势陡然严峻以后，港澳回归以后中国内地新设立的第一个专事港澳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第一个面向全国学界的港澳问题研究的专业团体——全国港澳研究会、第一个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港澳问题研究专业期刊——《港澳研究》等，都是在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直接领导和指导下开展工作的。

因应这样一种大形势、大背景、大环境，国内学界在港澳回归几年以

^① 《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4日。

后出现的这个港澳问题研究的“小阳春”，其形成的成果，呈现出两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其一，绝大多数都带有明晰而突出的问题导向，现实针对性彰显，都能够直面“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直面港澳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直面中央和特区关系、内地与特区关系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条分缕析式的逐项解剖和探索性的解答。即使是偏重理论性的探讨，也讲求理论联系实际的时效和实效，讲求对策性建议的可操作性。基本上属于“热点追踪”式的专题性的政策研究。其二，放置于“历史长时段”的、比较少的“现实功利”考量、比较多的“学理性探讨”之基础性研究、综合性研究、整体性研究相对薄弱。无论是相对专题性的港澳回归史的研究、新港澳“一国两制”建设史的研究，还是相对综合性、整体性的“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发展史的研究，都还没有出现真正有水平、有分量、有影响的代表性、标志性的精品力作，还处于前期成果的铺垫和学术积累的厚植期。这里，笔者之所以言近十余年来的港澳问题研究是一个“小阳春”而非“黄金期”，也正是从这一特定角度而论的。仅仅就学术研究的层面言，近十余年国内学界最大的收获，并非是一些有比较高的学术探索价值和意义但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研究成果的不断推出，而是在研究资料的挖掘和收集、整理和公开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当然，重点不是直接可以利用的历史档案原始资料方面，而在于我们国家以非常特殊之处理方式进行历史档案、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公开方面的重大进展——如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专题和综合性历史文献汇集、中国政府的各种专题和综合性历史文献汇集的编辑出版，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各种专题和综合性的文集、年谱、传记的编辑出版；重点是历史当事人的访谈资料或回忆录的编辑出版。这些，也都属于历史研究重要支撑的“第一手”资料。这一切努力，为未来一个时期港澳问题研究的重大突破、重大创新，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同时说明——这就是，以上所论基本上是针对香港回归以后的特殊情况，而不能简单、机械地比附澳门。“一国两制”之“港澳模式”，是由“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

集合而成的，在“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大的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在小的方面则千差万别，必须严格区分（关于此一问题，后面的相关章节中将作专门论述）。“九九”澳门回归以后，虽然在经济适度多元化方面、在公共行政改革方面，也遭遇到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但是其在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方面，其在处理与中央政府、处理与内地关系方面，则相对顺利和平稳，没有出现如香港那般的大起大落和形势逆转。在这样的一种大形势、大背景、大环境下，“九九”澳门回归以前就已经非常有基础的“澳门学”的学术研究，在“九九”澳门回归以后不曾间断、不曾停顿地继续向纵深推进，尤其是在澳门历史（主要是“葡人治澳”历史）的学术研究方面——包括基础性的研究资料之挖掘和收集、整理和公开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为未来一个时期澳门问题的学术研究——包括澳门历史的研究，自然延伸至澳门回归史、澳门“一国两制”建设史领域并取得重大突破、重大创新，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至于国外学界对于港澳问题的研究，此一时期仍然是延续传统的“大香港”、“小澳门”或曰“重香港”、“轻澳门”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而对于香港问题的研究，则又偏重于“九七”前和“九七”后的比较研究。由于西方国家“三十年”历史档案解密的规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涉及中英两国香港前途问题外交谈判的相关历史资料逐步公开，这就为国外学界根据一己历史资料单方面地重新解读香港回归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相当多的一部分学者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考量出发，将“九七”前中国政府承诺的“不变”与“九七”后中国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变”作对比，直接得出“一国两制”“已经走进死胡同”的结论，认为西方国家不能推卸而必须负起对于香港“一国两制”落实之“国际监督”责任。而在思想意识方面仍然严重受限于“西方中心论”的香港学界，仍然动辄以所谓的“国际标准”来衡量“九七”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绝大多数均为“时政性”的研究成果表达出对于香港前途将“内地化”的高度担忧和极度不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究其根本，还是“九七”香港回归以后中央政府发布的第一个专门论述香港问题的政府白皮书《“一国两制”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中所尖锐指出的那样：“‘一国两制’是一项开创性事业，对中央来说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对香港和香港同胞来说是重大历史转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的同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①

总体而言，目前海内外学界尤其是国内学界，关于本书的研究现状即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与本书所具有的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之价值和意义，以及学术创新的研究潜能和发展空间，是有非常大的距离的。在该领域，进行“自无至有”或“推倒重来”的学术探索、学术创新的任务非常重，纠错正谬、补遗弥缺的任务非常重，运用新资料、新视角、新方法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的任务非常重。

三、本书的研究重心和研究路径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究”的课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其一，为“九七”、“九九”港澳回归以前，“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下的香港回归史（1979—1997年）、澳门回归史（1985—1999年）的研究。但是这部分内容非本书研究的重点（这部分内容，在笔者以往的研究成果《日出日落——香港问题156年（1841—1997）》（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邓小平与香港回归》（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中已经有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梳理和阐释，仅仅是需要今后有机会补充新材料的修订再版），而主要是作为本书研究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支撑和铺垫；其二，为“九七”、“九九”港澳回归以后，新香港、新澳门的“一国两制”建设史的研究，这部分内容，是本书研究的主题和重心。当然，这两方面的内容，均将重点探讨“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如何从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2014年6月10日），《人民日报》2014年6月11日。